

生态女性主义 文化批判理论研究

陈
英
著

SHENGTAI NUXING ZHUYI
WENHUA PIPAN LILUN YANJIU



人民出版社

生态女性主义

文化批判理论研究



陈英著



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姜冬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研究/陈英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
ISBN 978-7-01-017688-8

I. ①生… II. ①陈… III. ①女权运动-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D4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4123 号

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研究

SHENGTAI NÜXING ZHUYI WENHUA PIPAN LILUN YANJIU

陈英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75

字数:275 千字

ISBN 978-7-01-017688-8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生态女性主义对西方传统二元论文化范式及其统治的逻辑的批判，到推动女性价值从边缘走向中心，融合二十世纪涌现的两大新主题——性别与生态，以“他者”视角揭示出其现代性问题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探索走向生态未来的他方道路。

作者简介

陈英，女，1975年3月生，湖南长沙人。1996年参加工作，2003年进入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攻读西方哲学专业研究生，2003年毕业，获硕士学位。2004年任湖南网络职业技术学院教师。2009年进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习，2012年获博士学位。现为湖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专职科研人员，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女性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等，出版专著2部，发表文章多篇。

责任编辑：姜冬红

封面设计：姚 菲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超越现代:后现代理论图谱中的生态女性主义 / 21

- 一、生态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 / 21
- 二、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 / 29
- 三、生态女性主义与深生态 / 34
- 四、生态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 39

第二章 为自然代言: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化本质主义批判 / 46

- 一、两种文化 / 47
- 二、女神精神 / 54
- 三、复兴真实 / 61
- 四、妇女的力量 / 69
- 五、回归母权 / 74

第三章 社会性别与自然的建构:生态女性主义的社会建构论批判 / 81

- 一、父权制“他者”的文化建构 / 82
- 二、二元论的统治逻辑 / 89
- 三、科学技术中的权力与价值蕴含 / 97

四、自然化政治与政治化自然 / 105

五、重建“她的”历史 / 110

第四章 文化与自然:生态女性主义的唯物辩证思考 / 117

一、超越本质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 / 118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启示与边界 / 124

三、文化与自然:不可避免的内在于性 / 131

四、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现代性歧路 / 138

五、生存视角 / 146

第五章 重估价值:生态女性主义文化价值重构中的反思 / 152

一、价值、语境与权力 / 153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选择 / 158

三、关怀:生态女性主义伦理的价值起点 / 165

四、生态民主与激进女性政治 / 172

第六章 通向未来之路:未来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吗 / 180

一、社会发展的必然与自由 / 181

二、现代性困境 / 191

三、时间中的历史 / 201

四、反思意识中的理论与实践 / 208

第七章 生态意识与文化环境: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化合理性 / 214

一、批判与变革:生态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起点 / 215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本质建构的否定意义 / 221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批判中的时代意识 / 230

四、多元与民主:生态女性主义的政治文化在场 / 237

第八章 我们的意愿：“我们”需要怎样的生态女性主义 / 244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理性启蒙 / 245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 / 252

三、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 261

四、生态女性主义的启蒙批判 / 267

五、我们的意愿：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女性主义 / 276

参考文献 / 286

后 记 / 294

绪 论

一、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保护运动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个新兴词,但妇女参与环境保护运动却不是新兴事。现代环境保护运动兴起于20世纪中期,不能排除妇女所作的贡献,卡尔逊在《寂静的春天》中首次用数据罗列出对环境破坏的忧患,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玛丽亚·米尔斯(Maria Mies)等都是环境保护与生态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生态女性主义虽然与妇女参与环境保护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不是所有妇女参与的环境保护运动都称为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生态女性主义,有时又称为环境的女性主义(environmental feminism)或生态的女性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这三个概念都以妇女与环境、妇女与自然为主题,很多文献在非常相近的意义上类通地使用,但有时也暗含微妙的差异。根据维基百科全书解释,ecofeminism更倾向于用来指一种从理论上探讨妇女与自然本质关系的文化运动,而 environmental feminism 或 ecological feminism 更倾向于指那些女性主义运动中由妇女参与的环境保护运动。没有脱离实践的理论,也没有不以文化背景为依托的行动,许多在理论上颇有建树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同时也是环境保护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可以说,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女性主义的边界从来都不是很清晰,当一种由妇女参与的环境保护运动明显地带有对社会性别的关注与痕迹,当这种社会运动在可辩明的特征上既不同于单纯的女性主义运动,也不同于由男性发起的生态运动,那么,这样一种环境的女性主义运动,当然也有理由称为生态女性主义运动。20世纪环境保护运动不乏妇女参与,特别是在一些有影响的环境保护事件中,妇女

更是发起运动、推动运动、引领运动甚至主导运动的主要成员,也正是在这些事件中,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们试图发现一种生态女性主义的精神。

1. 印度的抱树运动。1974年3月26日,印度的高帕什渥村庄发起抱树运动,起因在于政府与企业签订森林砍伐合同,不顾地方村民反对强制进村庄砍伐树木,当当地男性村民都外出工作之时,他们的妻子闻讯赶赴现场,在与伐木负责人交涉无效的情况下,她们采取最简单的办法,紧抱大树,用身体阻挡伐木工人砍伐树木,这也是抱树运动这一名字的由来。消息传开后,其他各村村民纷纷起来响应,在对峙四天之后,伐木工人最终撤离。很快,抱树运动扩展到加瓦尔喜马拉雅山周围地区,许多地方纷纷效仿,保护当地的森林资源。1980年,抱树运动扩展到整个印度,鉴于地方村民施加的巨大影响力,政府开始考虑人们敏感的森林政策,停止公开砍伐树木。积极投身于抱树运动的主力军是印度北部的农村妇女。在印度北部农村的劳动分工中,男性外出从事有薪工作,妇女承担做饭、饲养家禽等家务劳动,她们从树林中捡拾柴火,从自然中收集饲料,森林破坏对她们造成最直接的伤害,使得她们不得不跑更远的路、花更多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日常工作。同时,妇女们还把抱树运动与反对男性酗酒联系起来,因为伐木承包商往往又是提供酒给印度男性的供应商。发展到后期,地方经济发展、地区贫困问题以及剥削问题等许多地方性问题都开始纳入抱树运动的视野。不过,妇女虽然是抱树运动最直接的参与者,但是其中许多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却是男性。诸如桑德拉尔·巴胡甘那(Sunderlal Bahuguna)1983年发起跨喜马拉雅山5000公里远足,传播抱树运动的精神;普拉萨德·贝哈特(Chandi Prasad Bhatt)提出“生态就是永久的经济发展”,获得拉蒙·麦格塞塞奖。印度的抱树运动被看作是最具生态女性主义意义的运动,为多数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引证为生态女性主义最主要与最自觉的政治实践,甚至以此来证明女性自发地具有通过保护自然来保护自我的倾向。然而,悖论性的是,那些参与运动的妇女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积极行动者。当然,对于1974年印度北部的农村妇女而言,生态女性主义仍然是一个未曾听闻的术语,她们只是为自己切身的生存需求而自发地组织起来,抗议砍伐树木,保护森林。

2. 美国的拉夫运河事件。美国的拉夫运河事件同样是一件女性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环境保护抗议活动。拉夫运河是美国纽约州一条长约1000米的废弃运河,最初是美国一家电化学公司倾倒工业垃圾的场所,后来出售给当地一家教育机构,接着被填埋起来进行房地产开发,在上面盖起了学校,修建了住宅。1977年,地区居民开始出现各种怪病。最早发现怪病与当地环境污染有关的是一位家庭妇女洛伊斯·吉布斯(Lois Gibbs)。作为一个拥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吉布斯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医院里,她的一个孩子5岁时就患有肝病、哮喘等多种疾病,不得不长时间地住院治疗。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吉布斯从报纸上看到她所居住的地方曾经是一个工业垃圾的堆放场所,因此怀疑孩子的病与当地环境的工业污染有关。接下来,她一家敲开周围邻居的门,发现其他许多家庭都面临类似问题,这更加证实了她的怀疑。吉布斯联络其他家庭妇女展开调查,并就此向相关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抗议。1978年,美国环境部门介入调查,证实了这个地方的土壤与水流受到化学污染。初期,政府仅采取有限的措施搬离部分居民,而没有对该地区进行彻底的隔离与清查。对此,吉布斯召集居民,成立拉夫运动业主协会,为维护她们的权益与健康进行不妥协抗争。迫于压力,政府最终彻底承认该地区为不适合居住区,并进行环境污染清理与整改。拉夫运河事件中,反化学倾倒的环境斗士们最初都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们在面对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对她们孩子、丈夫以及自己身体健康的威胁时,立即转变成了环境保护的女斗士。吉布斯作为一个最普通的家庭妇女,也由此走上了环境保护之路,她后来成立了CCHW(The Citizen's Clearinghouse for Hazardous Waste)网络组织,组织反对有毒废物倾倒。一些人批评在反对废弃物倾倒事件中妇女们过于激进,称她们为“歇斯底里的妇人”(hysterical wives),对此,生态女性主义常引用一位黑人妇女所言:“你完全正确,我是歇斯底里的。当这是相关于生死的问题,特别是相关于我的家庭与我的生死的问题,我就变得歇斯底里了。”^①

^① Aneel Salman, *Ecofeminism Movements—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46:4 part II, Winter, 2007, p.858.

3. 肯尼亚的绿带运动。与印度的抱树运动以及美国的拉夫运河事件有所不同,肯尼亚的绿带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1977年,肯尼亚的旺加里·马塔伊教授首先在肯尼亚内多毕发动绿带运动,组织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大量植树造林。从1977年到1980年,绿带运动共发动3000多位妇女,建立600多个苗圃,修建2000多个绿化带,种下了200多万棵树苗。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泛非绿带运动启动,绿带运动扩展至非洲其他国家,包括坦桑尼亚、乌干达、马拉维、津巴布韦等国家。旺加里·马塔伊除了鼓励妇女大量植树造林,还组织与领导保护公园绿地、保护森林的斗争,如反对在内罗毕乌呼鲁公园修建非洲最大的摩天大楼,反对把治瓦治公园改建为停车场,反对政府对内罗毕郊区卡鲁亚森林的非法占用等。与政府主流政治的冲突一度给绿带运动带来了一些阻力,当地政府有段时间关闭了绿带办公室,领导人旺加里·马塔伊也二次被捕,并受到暴力袭击。然而,绿带运动的发展并没有受到阻止,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绿带运动在非洲广泛发展至今,种植树木达到3000多万棵,并因此,旺加里·马塔伊教授获得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成为首次获得此奖项的非洲女性。绿带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妇女,但同时也包括部分身体有缺陷的残障人士,以及部分刚从学校毕业的人员,这些在公共领域承担就业竞争压力的人都能获得机会融入植树造林的工作中。可以说,绿带运动典型地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双重功能,既是一个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境保护运动,也是一个给妇女机会实现她们自身价值的女性主义运动,其中,妇女们植树造林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保护耕地,绿化环境;另一个宗旨就是通过植树造林解决农村妇女的能源、食物以及饲料问题,通过给妇女提供植树、看林、护林等工作岗位提高妇女的经济收入。绿带运动给妇女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植树造林的过程中,对于树苗的选择与培育,妇女们有权利作出她们自己的决定;妇女作为社会建设的平等参与者,展现出她们的创造力,改变了她们处于从属的社会状况;通过参与保护绿地与森林的抗议活动,妇女更多地出现在公共场合,在公共政治的舞台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表现了自己的领导力与影响力。

4. 印度 Navdanya 运动。Navdanya 意指“九个种子”,寓意印度食品安

全的主要来源。1984年,Navdanya作为“科学、技术与生态研究基金会”的项目启动,发起人为印度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者与物理学家席瓦。Navdanya运动的主要目标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农民权利以及发展有机农场,她们反对基因工程,通过建立种子银行保护种子,维护生物的多样性。经过20多年的努力,Navdanya运动在印度17个地区建立了111个种子银行,保存了3000多个水稻品种,以及小米、豆类、蔬菜等许多品种的种子。Navdanya运动保护印度地方性的生物知识,反对生物剽窃,她们先后培训了50万农民,60多万个农民家庭纳入Navdanya组织,她们鼓励农民维护自己的生物权利、食物权利,鼓励农民开办有机农场,建立有机农产品从种子到厨房的直销方式,给消费者提供健康、有品质、有保障的有机食品。Navdanya还在印度北阿坎德邦杜恩谷创建了一个学习中心,教育与宣传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运动的领导人、积极参与者以及运动所坚持的精神理念来说,Navdanya运动无疑义地标记为生态女性主义的社会运动;从运动发起的时间上来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态女性主义已经是一个得到广泛传播的概念,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些核心理念基本成形。在其网站上,运动领导人席瓦表明她所走的路是对印度抱树运动的继续,并明言她的生态女性主义原则,“生态与女性主义是不可分离的”,明言她的生态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就是要走向一种地球民主,即一种由地球上所有生物所共享的民主。Navdanya运动的宣言,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目标,都与生态女性主义原则一致。

当然,妇女带着性别身份参与环境保护的事件远不止这些,自有保护环境的抗争以来就有妇女参与的身影,而在环境保护运动活跃的20世纪,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女性更是成为当地环境保护的积极成员,日本妇女组织上万人参与签名反核试验活动,瑞典妇女组织向议会抗议在森林使用除草剂,德国妇女组织参与“绿党”,诸此种种。在中国,妇女参与环境保护的活动主要在妇联的组织下进行,如全国妇联组织的“抵制白色污染,重拎布袋子”“妇女参与节水”等项目,这种表现形式与中国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无论是性别问题或是环境问题,在中国都是作为主流政治的一个部分运行,全国妇联作为妇女参政议政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与

管理者,因此,妇女参与生态保护的行为也就由妇联组织展开。不过,在其他发达国家与一些发展中国家,面对环境危机,妇女更自觉地组织起来保护她们所居住的环境,抗议对环境的破坏,捍卫她们的生存权。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恰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思考的起点:为什么恰恰是妇女更能意识到环境危机的到来?为什么恰恰是妇女更具有环境保护的意识?为什么恰恰是妇女更愿意选择生态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现代科学带来的物质化的生活方式?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正是对这种问题的一种回应。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批判

语言是对世界的描述。当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出现,相应地也会要求有能够描述这种社会现象的语言。女性在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时提出环境保护的诉求,对此,我们需要诠释这种现象所代表的意义,生态女性主义正是进行这一诠释的概念符号。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克斯·德·伊芙博尼(Francoise D'eaubonne)提出。在1974年出版的《女性主义或死亡》一书中,弗朗克斯·德·伊芙博尼创造了这个新词——ecofeminism(生态女性主义),概念的灵感来源于当时中欧政治运动中涉及生态问题的女性主义运动,特别是当时成立的“生态学——女性主义研究中心”。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女性主义是当时并存的其他诸种“主义”中的一员,女性同时参与反战运动、反核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以及要求性解放与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运动。早期女性主义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即要求妇女平等的公民权。此一阶段,那些怀抱政治热情的女性作为反战者、环境保护者、性解放支持者虽然具有多种身份,然而作为女性主义者,对于究竟应当追求怎样的性别平等,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因为此时,形式上的性别平等已经获得阶段性成就,妇女作为公民普遍地拥有法律意义上的平等,许多国家也把性别平等纳入政府决策,但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实质上的性别不平等依然普遍存在。面对女性主义的政治回退,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女性主义者尝试寻找走出这一政治困境与理论困境的方法。弗朗

克斯·德·伊芙博尼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女性主义或死亡》肯定性别不平等的普遍存在,这种普遍性体现在性别不平等以文化的方式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存在方式。就这一点来说,弗朗克斯·德·伊芙博尼与波伏娃同出一辙,再一次重申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但是,更进一步地,弗朗克斯·德·伊芙博尼把西方文化对女性的贬斥与对自然的贬斥联系起来,她指出,女性往往被看作更倾向于自然而受到轻视,对女性的贬低与对自然的贬低被纳入同一个文化体系。性别不平等无处不在,无人不处于这种不平等关系之中,这种普遍性恰如人与自然之间的统治剥夺关系一样普遍。借助与环境运动和生态学的结盟,弗朗克斯·德·伊芙博尼放大了女性主义政治的目标,之前法国女性主义主要关注性解放、堕胎、就业等局部性的主题,之后这种政治视野放大到关注整个社会统治系统与生态系统,据此奠定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基调,也打开了后来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与理论批判的大门。继《女性主义或死亡》之后,弗朗克斯·德·伊芙博尼又出版了《生态女性主义:革命还是改革》一书,重申了生态女性主义政治的必要性,要求在女性主义与生态学之间“建立深层的革命性的联系”,并持有激进女性主义的立场,呼吁社会的彻底变革,呼吁一种后工业时代的生态女性主义组织。不过悖论性的是,从理论上,在弗朗克斯·德·伊芙博尼把女性主义推向激进政治,在现实生活中,她的行为却表现出作为她自己所批评的那种女性的无可奈何,嫁给了一个她讨厌的男人,有了一个孩子,并因此而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追求。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许多女性主义的认同,大家意识到,把女性主义政治与其他边缘群体政治联系起来,同时开阔了女性主义政治与女性主义研究的视野,能够给女性主义带来一种政治开放性与政治稳定性。1976年,美国教授勒斯特拉·金把“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引入课堂教学,并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发起人之一创办了有几百人参加的“女性与地球上的生命”座谈会,积极推动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发展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的社会运动。同一时期,一系列生态女性主义的作品出版,其中有影响的包括苏珊·格里芬的《妇女与自然》、玛丽·戴莉的《妇科学/生态

学》、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等都以女性与自然为主题,探究贬抑女性与贬抑自然之一普遍的文化历史与文化现实。一时间,生态女性主义影响扩大,不仅作为女性主义的一种新动向,而且作为生态主义不容忽视的一种新视野而异军突起。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与深生态学的对话,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化理论研究也从以法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中心,至 21 世纪扩展至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各地。

当把生态女性主义看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那么这一意识形态在弗朗克斯·德·伊芙博尼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之时得到正名,在勒斯特拉·金以及后来诸多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论述与讨论中绘出其形态,在与深生态学、生态社会主义、动物伦理学、后现代主义等 20 世纪的各种文化思潮交锋中得到传播与地域扩张。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显示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发起了一种新的社会运动,而在于她对一种新的社会运动的理解,在于她对这种运动中所蕴含的精神理念的肯定与传播,在于它把诸种女性与环境的互动纳入同一个范畴诠释,且不管是把这样一种关系称之为生态的女性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或是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不过,在一些学者的具体使用中,我们又能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这个术语在内涵上的一些微妙不同。有时候,女性与环境被看作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主导关键词,这时一个参与环境保护运动或从事生态反思的女性就是一个生态女性主义者,这样一种生态女性主义具有更广义的所指,如此界定,则蕾切尔·卡尔逊就既是当代环境保护运动与生态主义运动的先驱,同时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大多数时候,社会性别与环境才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主导关键词,只有当女性受其作为妇女的社会经验驱动产生环境保护意识,这样一种行为才能纳入生态女性主义的范畴,或是说,从社会性别视角反思妇女与自然、妇女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理论反思才可称之为生态女性主义。后者所指的生态女性主义就是一种更狭义的生态女性主义。20 世纪的生态女性主义者们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会发现环境恶化时为什么总是妇女受伤害最大,会反思为什么女性更倾向于具有生态保护意识,会鼓励贫困地区的妇女植树造林,会为受农药伤害的巴基斯坦采棉妇女呼吁健康与安全的工作环境。但是对于兰斯拉夫某个边远地区的、一个不愿意砍

伐她住房周围种植多年的树木的农村妇女,是否应当把她恰当地称之为生态女性主义者,却值得思量。

生态女性主义起源于女性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运动,如同它的前身女性主义,或她的同盟生态主义,因此,这样一个概念只有置于它所发起的政治运动的背景下才能理解。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生态女性主义可理解为是以女性以自我保护意识为前提而发起的保护环境行为;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生态女性主义则试图表明女性的文化诉求恰是生态保护的文化诉求,女性的文化价值恰好指向肯定生态文化价值的同一方向。生态女性主义者凯伦·沃伦总结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所论及的妇女—非妇女—自然之间多种关系,包括:1. 统治的历史文化起源与历史因果关系,其中涉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统治;2. 概念建构中的等级关系;3. 现象中的经验关系;4. 生产中的社会经济关系;5. 符号中语言文字关系;6. 文学表达中的隐喻象征关系;7. 精神与宗教关系;8. 认识论关系;9. 政治关系。^①

凯伦·沃伦用“被子”这个比喻来描述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内部的多元性与异质性。生态女性主义这个“被子”由许多异质观点缝合而成,在理解女性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这些观点具有不同立场,彼此之间采用不同方法。如果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来描述生态女性主义,那么,相比较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等家族,后者在所坚守的政治立场、看待社会问题的理论视角与理论方法等方面都具有更多相似性,家族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亲缘与密切,而生态女性主义这个家族彼此成员之间差异更明显,相互联系更松散,内部冲突与矛盾也更为错综复杂。不过,肯定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相互关联,肯定妇女解放这一女性主义的目标与生态解放这一生态主义的目标是一体的,批判父权制文化对妇女与自然的压迫,重申女性价值与女性精神,向往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存的未来,这些都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家族特征。但是,对于如何理解妇女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如何解释统治关系的起源,如

^① Karen J. Warren,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pp. 1-36.